

北京大学

20

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

张哲俊 著

吉川幸次郎研究



中华书局

教育部北京大学 985 学术规划项目
北京大学 20 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

吉川幸次郎研究

张哲俊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川幸次郎研究/张哲俊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4
(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严绍璁主编)
ISBN 7-101-04251-1

I.吉… II.张… III.①汉学-研究-日本-现代②吉川幸次郎(1904~1980)-人物研究
IV.K2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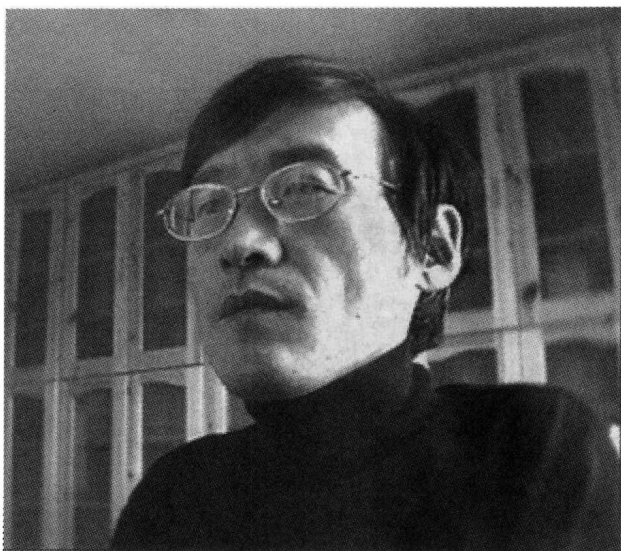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7546号

书 名 吉川幸次郎研究
丛 书 名 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
主 编 严绍璁
著 者 张哲俊 著
责任编辑 齐浣心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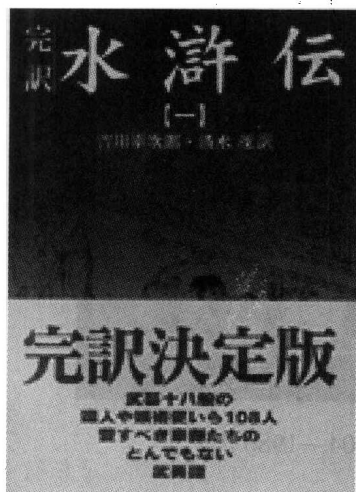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8月北京第1版
200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frac{1}{4}$ 字数314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251-1/K·1808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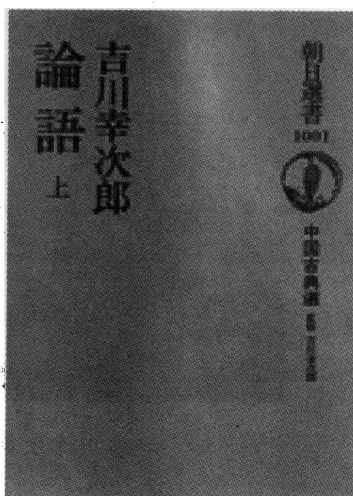
吉川幸次郎(1904—1980)



本书作者张哲俊



吉川幸次郎、清水茂合译
《水浒传》(日文版)



吉川幸次郎校注
《论语》(日文版)

总 序

严 绍 澧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Sinology”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化;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三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学术观念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①

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一部著作,是《北京大学 20 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的一种。它是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学术在关注国际学术界“Sinology”的学术趋势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为回应和盘点上一世纪这一学术而展开的专题性研究。

“Sinology”就其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而言,则是中国的人文学术,诸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考古等等,实际上,这一学术研究本身则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域外的延伸。从这样的意义上说,“Sinology”的学术成果,都可以归入中国的人文学术之中。但是,作为从事这样学术的研究

^① 关于“Sinology”的意义,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在行文中仍然使用“Sinology”。当使用译文时,译为“国际中国学”,但同时加一括号(汉学),以示对各学派的尊重。

者,却又是生活在与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教养,包括价值观念、人文意识、美学理念、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等等,和中国文化很不相同。他们是在由他们的文化铸成的“文化语境”中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则是他们的“母体文化”观念的一种形态。所以说,“Sinology”的学术成果,其实也是他们“母体文化”研究的一种。

由此考量“Sinology”的学术性质,可以说,这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

遗憾的是,直至目前,我国学术界仍然有不少人士常常误解了这一学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仍然有不少的学者,始终把“Sinology”这一学术与中国国内从事的本国文化研究混为一谈,视为一个体系、一种学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北京的两个最有名的大学中,一个大学出版了一种定名为《××汉学》的刊物,登载的几乎全是我国国内学者研究本国文化的论说;另一个大学召开了“国际汉学大会”,会上的发言者绝大部分是中国学者在谈论中国学术。所有这些都让国际中国学家瞠目以对、莫名其妙。

另一个误解是,有些先生以为,只要是个中国人,不需要什么必需的知识装备,只要在外国走一走,参观参观,回来讲讲在座谈会上听来的消息,说说在外国人的研究室中看到的题目和大学里收集来的课程表,就是“Sinology”了。

这样的遗憾当然是因为他们事实上还没有能够介入这一学术的相关的研究层面而造成的。实际上,“Sinology”具有确定性的学术内容。依据我们三十年间摸索这一学术的体验,本学术范畴大致应该具有如下的学术层面:

第一,关于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中国文化向域外的传播,构成国外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基础。文化的传递可以有多种渠道,包括人种的、典籍的、宗教的方式,以至现代的电子传媒。但是一般而论,文献典籍的传播是文化传播最主要的载体。因此作为“Sinology”的基础性研究,就必须从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文献,以原典性的实证方法论,解明中国汉籍向世界的传播,探讨这种传递的轨迹和方式,阐述其文化学的意义。失却了这一基本性的功能,所谓对“Sinology”的研究,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实,从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来说,一个人文学者,假如他的一生从未做过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那么他的所谓学术,便是大可怀疑的。

第二,关于中国文化在传入对象国之后,于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即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容纳、排斥和变异的状态。有人对把这样的文化研究纳入“Sinology”的学术范畴,大惑不解。但是,依据我们自己的研究所获得的深切体验,诚如前述,任何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观念和他的方法论,都受制于他的母体文化;而他的母体文化与中国文化交会接触的层面,便是造就他们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区域,这样形成的“中国文化价值观”支撑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的时候,有些“中国学”家的研究,使中国学者感到不可理解(这里只是就学术范畴讨论,不涉及特定的政治层面和更加广泛的意识形态层面),这是缘于他们在接受中国文化时形成的“文化的变异”所造成的。因此,研究异国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化的变异,便命定地成为“Sinology”学术范畴中的内容。

第三,关于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当然是特定的对象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国观”并不一定只有“中国学(汉学)家”才有。只要中国存在和活动着,中国之外的许多民族和国家,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有

对中国的观念。这些中国观念,在不同的时期,会对各国的“中国学(汉学)家”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许多学者标榜自己的“学术独立”,但是,无论是“顺时思维”或者“逆向思维”,任何学者都不可能离开他现时生存的环境而独立地生存,因而他的思维和对文本的解析,必定具有特定时期的社会总体思维的烙印(比较文化中称之为“社会集体无意识”),它们以公开的或隐蔽的、精致的或粗糙的多元形态存在。例如,我们现在可以指证 20 世纪日本“中国学家”中,几乎没有一位不受他所生存时代“中国观”的影响,想来欧美亦然。只有在总体上把握了特定对象国的各种“中国观”的形态与特征(尤其是主流“中国观”的形态和特征),才能在对特定国家的“中国学”的论述中具有理论的深度和宽阔的视野。事实上,从世界文化研究的范畴来考察,“国际中国学(汉学)”中的对象国的“中国观”的研究与阐发,本身就构成了特定国家的“中国学(汉学)”的重要内容。因此,无论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还是只进行这一学科中的某一层面或特定课题的研究,为了准确地(即科学地)把握和阐述客体对象,研究者对特定对象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中国观”及其历史源流的把握,应该是“Sinology”必不可缺的内容。这几乎成为考量一个“Sinology”研究者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

第四,关于在中国文化(以人文学术为主体)各个领域中的世界各国学者具体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方法论。关于这一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无须再讨论。但是,指出下列的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不要把对象国的次流学者的观点,当成是主流性观点;更不要把对象国一个学者的观点,当成是对象国的普遍性观点。三十余年来,我们曾经为自己这种在学术上的无知,闹出了好多“国际笑话”。我以为研究者只要遵守两个基本的学术原则,这种状态是完全可以不发生的,一是把对任何国家的“中国学”的研究作为“研究”来对待,即所谓的“研究”不是任意的拣拾外国人的“字纸”,研究者必须对特定对象国的“中国学”进行“学派”和

“学派谱系”的研究，起码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整体的或个别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定各国的“中国学家”们在他们自己国家学术谱系上的地位，才能避免由无知而造成的愚昧；二是研究者必须以忠诚于学术的心态来从事研究，不要试图利用学术来谋求实际的功利。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对象国的某位学者，其学术水平并不很高，却偏要在我们的杂志报纸上说“××国中国研究的权威学者”，甚至弄到对方专门申明自己不是“权威学者”。这种以学术为头头而谋求私利的心态和行为，实在是一种学术的腐败。

回想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内，当时的研究室主任孙越生先生筚路蓝缕，主持着一个“中国学研究室”，不定期的出版一份《外国研究中国》的刊物，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各人从自己能够看到的国外材料中翻译一些“世界对中国的研究”。这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最早的“Sinology”的专门性刊物。与此相呼应，1977年起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内也编辑一份《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这份出版物小得有些可怜。版面为大16开，每期20页，铅印的封面，打字油印的内文，每期约为2万字，是从日文和英文刊物上翻译过来的一些学术消息，自编自印，在同行中散发。这份看起来有点像“非法”的印刷物，却是为后来北京大学的“国际中国学(汉学)”作了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奠基——因为后来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认定的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室”，便是从这里发育出来的。1985年又从这里开始，正式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国际中国学(汉学)硕士学位方向”的硕士生(两名)。当时，我的想法是很幼稚的，就是让从事于中国古文化研究的同行，能够大体知道外国人是如何研究中国的。或许这是一个因缘，孙越生先生因此而与我相识。孙先生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对“Sinology”极为注目，立意要为此“做出点事业来”。于是，我们似相见恨晚，经常在一起，有时候在社科院孙先生的办公室里，有时候在东单孙先生的家里，共同研讨“Si-

nology”诸事。

我本人接触“Sinology”，要感谢我的老师——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主任的魏建功教授。1960年9月，当时我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第一届二年级的学生，在我的英文结业之后，魏先生又要我去学习日文。他对我说：“我们一定要去翻动那些日本人的著作，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不要让他们笑话了我们！”1964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张政烺教授指导）。魏建功教授劝我放弃升学，在北京大学从事“燕京（大学）—哈佛（大学）学社”的资料整理，以期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从事“Sinology”的人才。但当我刚刚在北大未名湖北岸“才斋”的顶层上为被封尘了十六年（1949年起）的“燕京—哈佛学社”的文献掸去尘埃，当年10月，作为主持这项研究的最高学术领导——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先生，忽然变成了“修正主义分子”而被驱逐出京城，到山东济南当了副市长。“燕京—哈佛学社”资料的整理也作为“学术领域的修正主义活动”而被停止。尽管如此，当时在我还年轻、无知的心中，留下了“燕京—哈佛学社”的事实和关于“Sinology”些微的知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尽管距我初次涉足“燕京—哈佛学社”已经过去十余年，我们又都经历了“文革”的沧桑之变，但心头的这个愿望，却总想着待机勃发。

孙越生先生对“Sinology”的执着，令我非常感动。大约在1977年的年底，他开始筹划“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的编撰，由此而开启后代各类“中国学（汉学）”丛书之先河。20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完全没有为“Sinology”这一学术准备最起码的材料。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的时候，他们的手边竟然没有最基本的学术资料。孙越生先生关于编撰和出版日本、苏联和美国三国的中国学具有基础性的连续资料的想法，实在是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思

维。冯蒸先生为此首先刊出了《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编撰的《日本的中国学家》，这是“中国学”中一部应用性的工具书。此书收录当时在世的具有高级学术职称的日本中国学者1,105人，辑录他们的著作10,345种，行文65万字。这或许是我国学术界关于“Sinology”的最早的一部工具书。尽管这部工具书需要提升的地方确实还不少，但当时却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起了提示析疑的作用。后来，姜筱绿女士等又编撰了《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下册)，孙越生先生领衔编著了《美国中国学手册》，从而完成了孙越生先生关于“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的第一步。

这里还必须要提到我国学术界在最早确立“国外中国研究”、“国际中国学”方面具有首创之功的两个似乎不为人们注意的非公开发表的刊物——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史通讯》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编，由中华书局出刊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自1978年开始，《中国史通讯》刊登了一些关于日本、法国、美国、荷兰等国学者对“中国史”研究的历史和现况，有综述描写，也有个案报道。它为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史的研究引进了新的视野。但是，人们很难想像的是，像《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这样关于“古籍整理动态”的专门性通讯，怎么会在70年代末就跻身于“Sinology”报道的首创行列呢？当时大难刚过，许多人对国际学术还双眼未开。记得教育部的官员拿着我申请前往日本的报告，在写字桌上敲了两敲说：“一个学中国文化的人，到外国去做什么！”可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却率先把学术的眼光移向世界，表现了当时作为该《简报》主编的杨牧之先生和他所在的中华书局的学术前瞻性。从1979年《简报》第4号起陆续刊登了严绍璿等撰写的关于日本对中国古文化研究的综合报道，如《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方面的见解》、《日本对〈诗经〉的研究》、《日本对〈尚书〉的研究》等，特别是在1981年3月，为全文发表严绍璿所

做的《日本学者近年来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而特设一期《增刊》。该文综述了日本史学界近二十年间关于中国史研究中六大问题的论争，即“中国文明起源的提法与关于黄河文明与河江文明的论争”、“甲骨卜辞的整理与关于殷代史的论争”、“秦汉帝国的社会性质和关于中国古代‘共同体’的论争”、“六朝社会的特点与关于‘豪族共同体’的论争”、“唐宋社会与中国社会特点的论争”、“明清研究与‘乡绅论’的论争”。此文后来被多次引用和重印，并在日本中国史研究者中有积极的呼应，表现了当时正在觉醒中的中国本土学术界对域外知识的渴望。这两个刊物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参与，表明了从70年代后期起步的这一学术，正在从最基本的学术资料的积累走向关于对“中国学(汉学)”具体学术成果的阐述和评价。

但是，在这一阶段中，尽管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了“Sinology”的关注，并已经实际地从事这一学术的基本建设，然而，就其对这一学术的理解和把握，仍然显得过于狭窄和肤浅。这一点只要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把“中国学研究室”设置在情报研究所中就可以窥见其一斑。而当时参与这一学术起步的刊物，也只是《中国史通讯》、《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和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自编的“消息”，这就是说，人们是把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还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情报”看待的。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Sinology”的研究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其中以“敦煌学”为领军，以史学为基点，旁及哲学、文学、艺术和考古等学术，我国学者较为全面地介入“Sinology”的各个领域，从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学理论说的阐发梳理诸层面，开始获得为各国“中国学家”所瞩目的业绩。与此相一致的，则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于1983年起，正式开设了“日本中国学”课程——这是我国大学史上第一门关于“Sinology”的课程。当时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古委会特地把这一课程摄制成36小时的教学录像片，在全国相关的校系专

业中以授课方式放映。1985年该专业正式招收“Sinology”硕士学位研究生,并于同年在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内建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室”。十年后即从1994年起,由于我本人的行政隶属由古文献研究所转为比较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又在比较文学研究所内设立了“Sinology”方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由孟华、严绍璿担任导师。根据世界学术的通例,当一种“研究”登上了大学的讲台,在大学中成为了稳定的课程,并有了相应学生的时候,这一研究便可以被承认是一门“学术”了。假如我们沿此通例,则可以大胆地说,“Sinology”大约是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北京大学为学术舞台,在我国学术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

1987年11月,北京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室”与深圳大学文化研究所在深圳联合举办“国际中国学讲习班”,约请李学勤、章培恒、汤一介、严绍璿,以及香港、澳大利亚的学者担任讲师,有七十余人参加。这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次举行的以“Sinology”为主题的全国性的研修会,它事实上宣告了在中国学术界,“Sinology”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已经形成。

我国学术界在创造“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道路上,已经走过了荆棘之路,在进入90年代以来,终于成为一门为世界瞩目的学术。我以为标志有五:一是大学对“Sinology”的重视和参与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继北京大学之后,清华大学建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建立了“世界汉学研究中心”等。这就意味着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它已经具有了稳定的学术基地。二是公开出版了具有学术专业性质的学刊。以任继愈先生为主编、张西平先生为常务编委的《国际汉学》,具有先驱之功,继而,阎纯德先生主编的《汉学研究》发刊,1998年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世界汉学》也相继问世。此外,全国各地尚有一些相关的刊物,如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等,这就意味着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已经具备了具有专业意义的学术成果公开发表的稳定的学术阵地,从而具备了进行国际学术对话的物质条件。三是有计划地把“Sinology”的成果推向

中国学术界。其中,中华书局有率先之功,先后推出了《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十卷本)等,引起中日两国学界的瞩目。继而,王元化先生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刘东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都陆续出版,这就改变了对“Sinology”成果研究的原始性的无序状态。四是开始了“Sinology”学术史的研究。在上述各项研究展开的基础上,我们已经有可能开始对特定的对象国的“中国学(汉学)”的学术的形成与发展、学派的组合与嬗变、对象国的“中国学(汉学)”与世界相关国家相关学术的关系等等,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条理、描述和阐发,从而形成特定的“学术史”。在季羨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的督导之下,1992年严绍璜首先完成了《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继而,有关德国、瑞典、法国、苏俄的学术史论著相继刊出或即将刊出。这就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在理论层面上已经具有深入把握各对象国“中国学(汉学)”内在结构的能力,并能够加以研究、分析和描述。五是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磨练,我国开始建立了一支从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为国际中国学术界所认可的、具备在国际学术界对话的高层次的学者队伍。2000年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钱婉约,以《内藤湖南研究》获得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国际中国学研究方向”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北京大学副教授刘萍,以《津田左右吉研究》获得北京大学上述相同研究方向文学博士学位。这是真正以“Sinology”作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学术界最先获得的博士学位。目前,还有博士生正在从事《服部宇之吉研究》和《德富苏峰研究》等。这意味着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文学术界中经过规范的高层次的学术训练,已经养成了具有相应的本学科专业知识、站在学科的前沿、牵动本学科的研究,并且可以进行国际学术对话的、更加年轻的“国际中国学”的学者了。

在“Sinology”的研究中,我本人一直有一个情结萦怀于心,这就是面

对发展着的这一学术,我以为我们应该以足够的学识和力量,进行“Sinology”学术史的梳理,推进包括综合性的和学者个案的研究,应该将此作为本学术学理认知和更加深入阐述的基础。1985年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日本学部客座教授期间,曾经和日本学者一起,反复磋商如何认识和把握20世纪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本质和业绩及其问题,一起拟订了一个认识“日本中国学”的具有学派谱系性质的四十余位学者的名单图谱,确认把握他们的学术状态和脉络,是进入“日本中国学”的钥匙。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学者的认识,但它毕竟构筑起了具有全局性质的系统,成为我们考量日本中国学的一个基本定位仪。我撰写的《日本中国学史》便是依据学派和谱系来展开论述的。因此,在我国“Sinology”学术中,推进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学者的个案研究,便成为理解一个国家的“Sinology”的基础。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北京大学当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何芳川教授的积极评价和鼎力支持,为此而数次到我家商量讨论课题的设置,立此项目于北京大学著名的“985”学术规划之中,并且将其内涵扩展至世界主要国家的“Sinology”研究,项目定名为“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汉学)综合研究”,分编为“日本编”,“法国编”,“美国编”等,研究业绩以《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文库》面世。

本文库在构思过程中,一直得到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特别是编辑室主任柴剑虹编审的支持。柴先生本人以“Sinology”学者入主汉学编辑室,他以学者的眼光审视本项目的进展及其研究成果,对于提升本《文库》的学术质量贡献至大。

回想80年代初期,当我们在“Sinology”的研究中刚刚起步的时候,邓广铭教授曾经特意鼓励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研究坚持下去……这个领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坚持十年,必然会有很大的成果的!”现在,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大地实现着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的步伐中,

中国学术界以自己艰苦的努力,终于造就了“Sinology”这一独立的学术,并进入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前沿。当我们在迎接新世纪曙光的时候,回顾这一学术的形成与发展,提升自己的学术认识,这对于在未来深化这一学术,将会是很有益处的。

《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文库》把“日本编”作为第一编公刊出版,由此而忆及三十年学术道路的万种景象,有感而发,是为文库总前言。

2004年4月20日(谷雨日)写于北京西郊
北京大学静园六院

作者任职: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所长
《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文库》总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顾问
国际比较文学会(ICLA)东亚研究委员会(CEAS)主席